

近期,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成功入选。黄山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玉石手工业“生产基地”,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认知的空白。独山玉作为黄山遗址的主要手工资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伏牛山南出美玉

独山玉出于南阳,又名南阳玉。所谓“山南水北谓之阳”,南阳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南阳成就帝业,南阳遂成“帝乡”;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名句,南阳还是刘备“三顾茅庐”典故的发生地,可谓是历史文化昌盛、人杰地灵之地。南阳人张衡在《南都赋》中称“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铅镴,赭堊流黄;绿碧紫英,青臈丹粟”,极言南阳的物产丰富,其中的“金彩玉璞”“绿碧紫英”指出此地的玉石器在汉代便有嘉名,独山玉想必也涵盖其中。

独山玉石玉质坚韧致密,摩氏硬度可达6至6.5,一般为玻璃光泽或油脂光泽,与和田玉相比,温润度略差。但是,质量较高的翠绿色独山玉与翡翠相似,故又被称为“南阳翠”。独山玉的色泽大都斑驳陆离,有绿、粉、白、紫、黑等色调,一块玉石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属于多色玉石的范畴。缘于其多色性,常见的独山玉制品多用俏雕技法雕制大型山水花鸟摆件,首饰之类的小挂件则相对少见。

《韩非子·和氏》记载,“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楚人和氏最早发现和氏璧玉璞是在楚厉王时期,当时楚国国都在丹阳。现在一般认为丹阳的地望(地理位置)在南阳淅川县,故又称“丹淅”。所以,和氏得玉璞的“楚山”很可能是同样在南阳境内的独山,即现在的独山风景区内。另有学者从姓氏角度调查到南阳市独山脚下有一个名为和庄的村子,居民以“和”为姓,这为推断楚人和氏为南阳人提供了一些旁据。从现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来看,和氏璧为独山玉的观点是较为可信的。



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独山玉材质玉铲。



现代独山玉绿白料挂坠。



元代渑山大玉海。

渑山大玉海

目前,和氏璧是否为独山玉还存在一些争议,元代的渑山大玉海则确定为独山玉材质无疑。渑山大玉海又称玉瓮、酒海,是由整块独山玉石雕琢而成,呈椭圆形的大钵,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型玉雕。玉瓮颜色正如乾隆帝所言“青绿间以黑白章”,周身雕琢龙、犀等神异海兽,嬉戏于浪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气势雄浑,颇具神秘气息。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中记载,“己丑,渑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己丑日,渑山大玉海雕刻完成,置于广寒殿中。乾隆皇帝所作《玉瓮歌》的引言中有关于渑山大玉海经历的详解:“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贮酒三十馀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寿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见《辍耕录》及《金鑿退食笔记》。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殿中而系以诗。”

出身皇家作坊的渑山大玉海曾遗落民间,据《辍耕录》和《金鑿退食笔记》的记录,它成了真武庙道士的腌菜缸。后幸得乾隆识宝,命以千金买回置于承光殿中。关于渑山大玉海“渑山”一名的来历,乾隆皇帝在其所作《观承光殿玉瓮再作歌》的“按”中还有考证:“盖渑山即琼华岛,以四面皆有水围是山耳……若以渑山为产玉之地,查元史外国传,不载于阗等产玉诸国,亦无渑山之名,更可证非举其出产之地。至《汉郊祀志》所云,渑山乃蜀之岷山,不闻产玉也。因作是歌并识于后。”乾隆遍寻渑山大玉海的产地而不得,他认为渑山即琼华岛,因其“以四面皆有水围是山耳”而得名。虽认识有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乾隆能做那么细致的考证实属不易。其实,根据外在形态、颜色及成分等分析,渑山大玉海当为南阳独山玉无疑,“渑山”应该就是“独山”的谐音。

低调的名玉

独山玉虽与和田玉、岫岩玉、蓝田玉(一说是绿松石)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但认知度是四类玉器中最低的。被誉为“名玉之首”的和田玉最负盛名;岫岩玉因产量大、价格低廉在市场上极为常见;蓝田玉秉着李商隐“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名句,名气较岫岩玉也不遑多让;唯独独山玉知之者甚少。

从现有发现来看,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料极为丰富,包括砂质制玉石器工具2.3万余件、玉片玉料数千件等。可以想象这个5000多年前的玉器加工基地曾是如何繁忙。随着南阳黄山遗址入选“2021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项目及“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独山玉作为黄山遗址的重要文化符号,也吸引了一批文化爱好者的关注。

针对如何提升独山玉知名度的问题,南阳文旅部门还专门举行了研讨会。笔者在会上建议,可举办大型的独山玉展览,将黄山遗址发现的独山玉标本、历代可确认为独山玉材质的玉雕文物和一些现代独山玉精品雕件收集后办展。如能借到渑山大玉海作为明星文物展出最好。也有学者提出渑山大玉海作为“镇国玉器”,能借出参展的可能性较小。建议用材质较像的独山玉对其进行复刻后展出,并将独山玉作为文博单位文创产品的材料。

玉器承载了中国人对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理解,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随着相关考古资料不断被发现和文旅部门的大力宣传,独山玉文化将得到更好地发掘和传播,为中华玉文化添墨加彩。

(据《海南日报》)

晚清浅绛彩画师“喻春”压手杯



图1

图2

这只压手杯,手可盈握,亮睛之笔是杯身上的浅绛彩花鸟图案(图1),黄色绣球花的旁侧,伸出一个枝头,上伫立着一只白腹绿身的绣球鸟,绣球鸟张嘴鸣啼,头向下倾斜,似乎对应下方同伴的呼唤,极尽传神。“双绣”组合的画面清雅美丽,特别耐看,尽管瓷画已距今一百多年,也经得住细观。

杯身另一面(图2)行书款中有“喻春”二字。“喻春”是晚清的一位浅绛彩画师,字子良,堂名“裕德堂”,擅绘浅绛彩山水、花鸟及粉彩人物。喻春作品以花鸟为多,他这个名字似乎就是鸟语花香的象征。喻春所绘白头翁、翠鸟、画眉、公鸡、仙鹤等皆生动可人。喻春大概平日里经常对着鸟类写生,甚至不排除他饲养过一些鸟类。

查阅史料,在高手如云的浅绛彩名家之中,喻春的名气并不算出众,但很多时候“名气”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其真实技术水平。比如喻春的精品,甚至不输同时期的一些名家大家之作。不显大名,加之存世有量,喻春的作品为民间瓷器藏家广泛拥有。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喻春浅绛彩瓷的仿品出现不少,购藏时需慎之又慎。

不作人名,“喻春”之名好听的容易被记住。无法四季如春,索性时刻喻春,这是发自内心的从容和安详,像一缕暖阳一样,散发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也照耀在这只压手杯上,杯上的绣球花和绣球鸟由此显现出更鲜活的生命。

(据《收藏快报》)

“金枝玉叶”货真价实

金蝉玉叶发簪,明代。金蝉外翼长1.7厘米,宽0.8厘米,玉叶长5.2厘米,宽3.2厘米。

这是一只形神毕肖、金光闪闪的蝉,嘴巴微开,好似在奏鸣。3对蝉足有的翘起、有的微微抬起、有的藏于腹下。整个蝉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玉叶则叶脉分明,洁白无瑕,将金蝉托起。玉叶有主脉一根,两边各有支脉4根。叶片正面的叶脉雕琢成凹槽状,背面的叶脉相对凸起,整片叶子的边缘圆润光滑,使叶片极具真实感。

金蝉玉叶发簪的金蝉含金量很高,成色达到95%,而其外翼厚仅0.2毫米,突出了蝉翼轻而薄的特点。玉叶采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晶莹剔透、温柔细腻。金蝉玉叶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金蝉采用压铸范、薄叶延展、篆刻、焊接等工艺;玉叶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等多种琢玉工艺,抛光细腻,薄胎圆润,琢工精致,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整个画面构思奇巧,动静结合,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

(据《内蒙古日报》)

青铜打马格棋



棋类游戏古称博奕,它是我国一直列入体育项目中的一项智力活动。宋代有一种打马格棋游戏,曾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喜爱的休闲活动。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著有《打马图经》,她在序中自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寢食”,可见其投入之深。

打马格博弈起源于唐代宫廷,盛于宋代,明清之际渐渐淡出。打马格博弈是一种操作规则复杂的活动,参与人数为2至5人,棋盘上首为一大横格,下首为十排,每排九格计为91格,每相隔九格为一窝,共11窝。参加人员用铜棋子20枚置于盆中,下棋者先以掷骰子点数之大小,然后根据三颗骰子所掷总点数走格。骰子形状同现在类似物,其中一、四数点红色,其余黑色,具体搓骰子分56色,又分为赏色、罚色、杂色,各色皆有一定的操作规则。比如走棋点数刚巧入窝,则后面棋子不论多少点只能倒走。博弈对局者还要将对方棋子打出局外,这就需要运筹谋划,也是最精彩之处。博弈的结局称为“细满”,部分出局称“粗满”,走棋多方要经过无数次反反复复较量才能大功告成。

(据《西安晚报》)

藏书·刃锋木刻集



《刃锋木刻集》封面。

《刃锋木刻集》,1947年4月初版,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发行,收录汪刃锋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木刻作品三十幅。其中第二幅是三色套印,画名是《陪都剪影》,附录有茅盾《看了汪刃锋的作品展》、叶圣陶《刃锋的木刻与绘画》,最后是《后记》。

汪刃锋,安徽全椒人,原名汪亦伦,笔名刃锋。他从1938年起从事木刻创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用木刻刀作武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创作出表现抗战激情和人民艰辛的作品,振奋民族精神。

(据《新民晚报》)



“红娘”霁红釉长颈胆瓶

霁红釉长颈胆瓶,小口,长颈,圆腹,圈足。瓶高22厘米,口径2厘米,底径5厘米;胎体白中泛黄,内施青白釉,釉汁纯正凝厚;外壁通体施霁红釉,釉面细腻匀净。整件器物俏丽优雅,似一袭红衣的嫁娘,袅袅婷婷。

霁红釉,又名祭红釉、积红釉、醉红釉等,创烧于明代早期永乐年间,釉色殷殷,如初凝之鲜血,夺目而不落艳丽,浓郁而不失润泽。《历代名瓷图谱》中记载:“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收藏者朱卫东说这件胆瓶釉色红艳,口沿带一圈洁白的灯草边,红白相衬,分外雅致,足底有青花书写“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严谨工整,蓝料青翠明快。

说起这件瓷瓶的收藏,还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多年前,朱卫东在一次清代瓷器展览会上邂逅到这件宝贝,一见钟情。当时和朱卫东竞争的还有一位外地藏友,双方都不肯放手。在主办方的协调

下,朱卫东和竞争者见了面,对方居然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说起瓷器头头是道。得知她要借助这件霁红釉瓷器完成清代古董研究的硕士论文,朱卫东忍痛割爱放弃了这件宝贝。为感谢朱卫东的“成全”,姑娘邀请朱卫东去参观她的藏品。俩人都是收藏发烧友,有共同话题,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从秦砖汉瓦聊到人生哲学,又相伴去看展览、逛博物馆……一来二去,朱卫东的竞争者成了他的妻子。

胆瓶在清代到民国时期就被称为“嫁妆瓶”,是女儿出嫁不可少的陪嫁品。说来也巧,朱卫东成家时,这件霁红釉胆瓶作为陪嫁品随它的女主人来到朱卫东家。朋友们说朱卫东“先娶佳人,再得宝贝,双喜临门。”

相比那些珍藏于博物馆的国宝级霁红釉,这件“嫁妆瓶”的釉色并不完美,甚至工艺也略显粗糙,但它在朱卫东心中却是千金不换。因为它不仅成就了朱卫东和妻子的姻缘,器物上火红的釉色更是他们俩人相知相伴、同心遨游“瓷海”快乐人生的美好见证。

(据《内蒙古日报》)